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1.02.015

地域文化视域下界首彩陶历史脉络及艺术特点探析

高峰, 周稳

(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 界首彩陶是传统文化的载体, 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其原材料来源于颍河泛滥留下的大面积黏土沉积层。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等人文因素也对界首彩陶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是界首彩陶质朴自然艺术风格形成的基础。界首彩陶的烧制最晚始于宋代, 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界首彩陶的纹样主要有植物、动物、人物纹饰三大类, 器物造型有壶类、瓶类、碗盆坛罐类, 釉色以赭红、明黄、褐绿为主, 拥有“红地白花”的特色风格, 为当下学界对界首彩陶艺术特点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 界首彩陶; 历史脉络; 艺术特点; 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 J5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1)02-0117-08

引用格式: 高峰, 周稳. 地域文化视域下界首彩陶历史脉络及艺术特点探析[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6(2): 117-124.

Analysis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Jieshou Painted Potte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ulture

GAO Feng, ZHOU Wen

(School of Ar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00, China)

Abstract: Jieshou painted pottery is the carrie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as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Its raw materials come from the large area of clay deposits left by the flooding of Ying River. The local customs, historical cultur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human factors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Jieshou painted pottery, which is the basis of the formation of Jieshou painted pottery's simple natural art style. The firing of Jieshou painted pottery began in the Song Dynasty at the latest and flourished since the 1980s. The patterns of Jieshou painted pottery mainly include plants, animals and figures. The shapes of utensils include pots, bottles, bowls, pots and jars. The glaze color is mainly ochre red, bright yellow and brown green.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style of "red ground and white flowers", which provides rich material data for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Jieshuo painted pottery.

Keywords: Jieshou painted pottery; historical context; artistic features; regional culture

收稿日期: 2020-12-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淮河流域民间陶瓷工艺的生产性保护”(17BG147)

作者简介: 高峰(1967—), 男, 安徽界首人, 安徽大学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设计艺术学;

周稳(1997—), 男, 安徽六安人, 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传统工艺美术。

界首市位于安徽省西北部,毗邻河南省郸城县、沈丘县及项城市,由此成为江淮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门户。界首彩陶是界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代表,“中国近代四大彩陶”之一,它融合了北方文化的豪爽开朗、豁达刚劲以及南方文化的清新淡雅、婉约柔美,被赋予了兼容并包的特性,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格特征。界首彩陶经历元代中期至明代晚期、清代晚期至民国末期、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四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最终演变成为淮河流域乃至徽皖地区独树一帜的“活态非遗之花”。2006年界首彩陶烧造工艺经国务院批准,被文化与旅游部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中国界首彩陶发展论坛”于界首市成功举办并出版同名论文集;2020年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界首彩陶》一书。这些对界首彩陶的多维度展示使其在当代获得了更好的传承发展,并向更专业的学术平台和更广阔的艺术舞台迈进。当下学术界对于界首彩陶的研究依然多集中于其在当代社会语境下的传承、发展、延续等应用性研究,相关论文占界首彩陶研究论文的六成以上,如吴从瑞《走出困境与依附——探寻时代背景下界首彩陶传承与发展之路》、朱铁军和黄凯《界首彩陶走出困境与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许政《界首彩陶创意产业化路径研究》等,关于界首彩陶的历史脉络、艺术特点、地域文化等理论性研究则较少。本文基于界首当地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背景,对于界首彩陶的形成、发展、初始及兴旺等历史脉络进行细致梳理和严谨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界首彩陶纹饰、器型、色彩等艺术特点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总结,希冀其能增加当前学术界对于界首彩陶理论性研究的深度及广度,有助于提升界首彩陶于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的地位。

一 界首彩陶的历史背景

徐艺乙教授在《论民间艺术的基本特征》一文中提到:“一项民间艺术的产生无外乎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两方面的影响,一定区域内气候条件、地理变化、海陆位置、动植物资源等自然因素的不同以及一定区域内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的

差异,使创造出的民间艺术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彰显区域性特征。”界首位于黄淮平原,淮河最大支流颍河蜿蜒匍匐于此,地理条件优越,土地肥沃,孕育出浓厚兴旺的民俗文化以及淳朴自然、率真坦荡、豪迈不羁的人文气息,并由此产生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界首彩陶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历史上颍河多次泛滥成灾,《元史·河渠志》中便记载:“陈、颖濒河膏腴之地浸没,百姓流离。”^[1]但泛滥的河水也在界首北部、中部形成大面积的黄泛平原并留下大面积黏土沉积层,这种黏土被当地民众称为“黄胶泥”或“大胶泥”,其土质细腻、可塑性强并具有强大的造型表现力,从而成为界首彩陶的主要制作原材料。距界首不远的萧县白土镇白龙山和盆张窑陶庄湖蕴藏了大量含铁量较低的白色瓷土和含铁量较高的浅灰色瓷土,可用于界首彩陶的复施化妆土工艺,这也形成了界首彩陶独具特色的“白地红花”独特风格,使得界首彩陶拥有更加优良的质量和艺术价值。同时,界首地区自古便是中原地区通往江南的必经之路,各朝各代均在此设置驿站和监镇官,负责征收赋税并为过往商旅提供住宿。明朝末年界首地区商业活动蓬勃发展,逐渐成为皖西北地区商品交易中心,界首彩陶也伴随当地经济的繁荣得以扩大销售、快速发展。界首颇具特色的地域环境及丰富的物质资源为界首彩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自然基础。

除自然因素外,界首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等人文因素也都对界首彩陶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是界首彩陶艺术风格形成的基础。界首地区位于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是中原文化和江淮文化交流的门户,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民间艺术种类丰富,民俗活动丰富多彩。界首彩陶长期受到当地民俗审美和地域文化的浸润,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水平。例如,界首地区拥有远近闻名的大黄庙会,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六日举办,为期10天,《界首县志》中便记载大黄庙会朝拜者众多,极盛时甚至云集十余县市数十万人,这不仅成为界首彩陶的展示舞台,也成为界首彩陶的销售交易平台。除大黄庙会外,界首地区的集会、节令、祭祀、丧葬婚嫁、信仰崇拜都或多或少影响了界首彩陶的产生、发展、演变。同时界首地区民间戏剧文化繁荣,豫剧、评剧、

花鼓戏、黄梅戏、淮北梆子经常在当地的大街小巷上演, 成为界首地区人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 诸如《老山羊》《西厢记》《桃花庵》《蝴蝶杯》《玉虎坠》《白蛇传》等剧目常常被用作界首彩陶的刻花纹样装饰, 丰富了界首彩陶装饰的表现技法和工艺技巧, 也极大程度提高了界首彩陶的文化艺术内涵^[2]。在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界首当地陶匠将中原文化和江淮文化融会贯通, 采取民间戏剧的内容、木刻年画的版式, 根据界首地区百姓的生活方式与生产习俗, 创造出早期界首彩陶, 并凭借精妙绝伦的制作工艺、质朴自然的民间风格、扣人心弦的表现技法在此后百余年间长盛不衰。

二 界首彩陶的发展阶段

陶器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传统民间手工艺之一, 产生于新石器时期, 拥有敦厚质朴、自然洒脱的艺术特点, 并凭借层序分明的形制、和谐流畅的比例、丰富多彩的纹样及实用化特征而广受欢迎。根据史料记载和当下学者的研究证明, 界首彩陶基于界首地域文化, 经历元代中期至明代晚期、清代晚期至民国末期、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至今四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 最终演变成为淮河流域乃至整个徽皖地区独树一帜的“活态非遗之花”。

(一) 界首彩陶之始

界首彩陶始烧与起源的具体时间并无明确记载, 但是可从近些年关于界首彩陶的考古发掘中大致推测出其发展脉络。20 世纪末, 中国国家文物局组织大量专业人员对安徽省淮北市柳孜镇内一路段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一座沿运河南岸东西走向顺河而建的码头揭开了神秘的面纱。码头四周土层中发现了八艘大型古代沉船和一口宋代井, 共出土陶瓷器近两千件, 各类瓷片万余件, 引发国内外学界轰动^[3], 被称为 1999 年度“考古十大发现”之一。此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界首彩陶完整器和陶片, 这为我们研究界首彩陶的始烧和起源年代提供了宝贵物质资料, 并让我们准确推断出界首彩陶的烧造制作最晚始于宋代。

元代中期到明代晚期是界首彩陶发展的第一阶段, 此时期颍河泛滥留下的大面积黏土沉积层

使界首彩陶拥有大量简单易得的陶土资源, 极大提高了界首彩陶造型表现力。这一时期界首彩陶在制陶、烧造手法上广泛汲取北方民窑先进经验, 在纹样内容和技法上积极吸收当地戏曲、剪纸、木版年画的文化艺术内涵, 在装饰手法上多采用模印、刻花、贴花、绳纹、贴塑相互贯穿相结合的方式的综合表现, 最终呈现出简单明快、酣畅淋漓、豪放不羁的艺术美感。例如现藏于界首文管所的元代荷花纹小口罐、绿釉瓜棱陶罐和明代酱釉弦纹瓜棱罐、三彩刻花纹盆、绿釉开光侍女纹罐等器物都很好地展现了此时期界首彩陶优良的制陶技艺与发展势头^[4]。清代晚期至民国末期是界首彩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也是界首彩陶走向成熟的关键节点, 此时期界首彩陶的器物造型大多圆润饱满, 施釉至下腹部, 近足部通常刻画数道凹凸弦纹, 以防止烧造过程中釉料下滴。装饰技法在继承前期精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刻画了大量界首当地的戏曲文化场景和人物形象, 《西厢记》《桃花庵》《白蛇传》等经典剧目纷纷出现在界首彩陶的刻花纹样之上^[5], 例如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清代三彩剔花花卉四系壶、三彩剔花福祿寿人物纹罐(图 1)及个人收藏的民国三彩剔花戏剧纹样大罐都可以体现此时期界首彩陶的艺术美学价值。



图 1 清代三彩剔花花福祿寿人物纹罐

(二) 界首彩陶之兴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是界首彩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建国初期, 国家有关部门和安徽省委便选派界首知名陶匠卢山义和卢山志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班研修先进制陶技艺, 使得此后界首彩陶的绘画、剔刻、制坯等工艺得到长足进步。1954 年卢山义及卢山志学成归来, 在界首当地组

建陶器生产合作社,基于界首地域文化生产大量满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陶器,同年庐山义所制作的三彩刻花刀马人物纹酒罐被前苏联《造型艺术画刊》杂志收录,苏联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长莫洛卓娃评价其为“古老东方艺术的精华”,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反响,并引发国内外博物馆及个人收藏家的界首彩陶收藏风潮。1960年,界首工艺美术陶瓷厂正式成立,初期以烧造实用性器物为主,后期伴随时代发展转为实用与陈设器物兼烧,并且在陶器的生产制作上引入专业分工、各司其职的方式,起泥练泥、拉坯制胎、修坯施釉、刻花装饰、入窑烧制都由各领域专业人员负责,使得界首彩陶制陶技艺与装饰技巧突飞猛进。20世纪60年代后界首彩陶的制作技艺和艺术价值均获得突破性进展,安徽省政府委派轻工业厅工艺美术研究室有关人员前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湖北艺术专科学校(今湖北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艺术专业院校遴选年轻民间工艺美术设计师入驻界首工艺美术陶瓷厂,进行现代题材界首彩陶的创作,把先进设计理念与制陶技艺带入界首彩陶,促进了界首彩陶在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陶瓷艺术、学院艺术、工艺美术等在创作题材、表现形式、工艺手法等方面的融合,并且体现界首彩陶作为民间艺术在内容创作上的博采众长及在展现方法上的勇于创新。此时期党和政府给予界首彩陶极大的关心与重视,不仅推动了界首彩陶的发展,而且使界首彩陶真正走上兴盛之路。

(三) 界首彩陶之盛

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界首彩陶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界首彩陶在各方面均获得突破性进展,也是界首彩陶由兴转盛的关键节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时任安徽画院(现为安徽省书画院)副院长的韩美林带领一批艺术专业院校优秀毕业生组成攻关小组进驻界首工艺美术陶瓷厂,结合界首彩陶传统制陶技艺,推陈出新创制出硅-硼系列无毒彩釉,极大地提高了界首彩陶烧制温度,将界首彩陶由低温形陶器转变为高温型陶器,使胎釉结合更加严丝合缝、造器物型更加琳琅满目、釉色更加绚丽灵动。技术与艺术双层面的跨越性进展使界首彩陶在这一时

期获得“安徽省科学技术发明奖”“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等一系列重要奖项。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一级美术师、安徽省陶瓷雕塑艺术家闫玉敏深入界首陶瓷厂一线,将传统雕塑艺术和界首彩陶制瓷技艺相融合,利用雕塑艺术里的线性美学特征对界首彩陶独特的艺术魅力进行表现和凸显^[6],制作出《渔歌》《十二乐俑》《东方微笑》等作品。这些作品体现了界首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国内外广受欢迎,并于2004年获安徽省工业博览会金奖。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界首彩陶烧造工艺被文化与旅游部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界首彩陶的发展、传承、保护均进入全新的阶段。21世纪,安徽省委、省政府大力促进界首彩陶的产业化发展,集中力量分析、发掘、归纳界首彩陶的艺术内涵和文化价值,建设界首彩陶的应用传承环境,并保障界首彩陶生态培育有序协调进行。界首市委、市政府大力打造界首彩陶艺术名片,积极规划建设“界首彩陶文化公园”“界首彩陶特色小镇”“界首彩陶博物馆”“界首彩陶十三窑窑址生态博物馆”“界首彩陶艺术中心”等公共场馆,邀请闫玉敏、赵梦、张存世、卢群山、王京胜、卢莉华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界首彩陶技艺传承人为界首彩陶的发展与传承建言献策,使界首地区成长为中国彩陶艺术的设计研发、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中心。同时结合当前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建立界首彩陶网络销售平台,在品牌打造和销量提升上发力,打破原有只在线下销售的禁锢,引导其准确定位目标市场,为界首彩陶的持续兴盛提供强有力支撑。

三 界首彩陶的艺术特点

从简到繁、从拙到巧、从圆器到琢器、从素烧到釉烧、从无饰到有饰,界首彩陶以淳朴自然、率真坦荡、豪迈不羁的风格,给人以韵味率真、敦厚质朴、遒劲有力的深刻美学感受。界首彩陶经百年风雨变迁,依托界首地域文化和民风民俗,由实用型器物转型为实用陈设复合型器物,具有“朴似天然,动之有力,形自逼真”的艺术美感^[7]。界首彩陶的根源便是界首当地的地域文化,可将其视为一种地道纯粹的民间传统工艺美术,是当下学术界研究界首地区民间社会生活、社会风貌、社会人文的重要艺术载体。总体来说,界首当地

地域文化是界首彩陶艺术特点形成的源泉, 界首彩陶诸如纹样装饰、器物造型、釉面色彩等艺术特点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界首当地地域文化的艺术性表达^[8]。

(一) 界首彩陶的纹样装饰

界首彩陶的纹样装饰来源丰富、取材广泛, 由工匠运用铁制尖锐工具在陶坯上划刻而成, 利用划刻速度的快慢及力度的深浅对不同图案进行表现, 使之形成长短、疏密、粗细、大小、虚实的对比关系, 凸显极具韵律、节奏和动态的形式之美, 表现出古朴大气、率真有序的独特民间艺术风格。界首彩陶纹样按照题材不同主要分为植物纹饰、动物纹饰及人物纹饰三大类。

1. 界首彩陶植物纹样

植物纹饰在界首彩陶之中运用得最为繁多。在自然界中常有的植物形态和其他民间工艺美术图案的基础之上, 工匠按照自身对界首彩陶纹样装饰的理解与意图重新提炼、整合、设计, 运用简洁明了的形象表现形形色色的纹饰内容, 运用简洁有力的视觉元素勾勒夸张诙谐的民间形象, 最终以贴合界首地域文化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来。界

首彩陶中时常出现植物纹饰包括牡丹纹、菊花纹、茴香瓣纹、桃纹、莲花纹、卷草纹、松枝纹、梅花纹等^[9], 如图2。其中牡丹纹多以宝相花形式作为中心主体, 周边刻画缠枝藤蔓纹样, 线条流畅洒脱, 造型饱满夸张, 整体风格雍容大气, 从纹样的刻画与布局可以看出工匠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高超的艺术审美; 茴香瓣纹主要为四瓣花二方连续纹样, 界首彩陶工匠别出心裁地利用茴香纹四个梭形花瓣的形状特性, 按照对角线方向排列交叉于中心点后形成单独纹样或联系纹样, 风格大胆, 造型超脱; 菊花纹主要用于合适纹样和二方连续纹样, 其中合适纹样多做宝相花式纹样和折枝纹样, 二方连续纹样多做藤蔓纹样和缠枝纹样, 体现了界首彩陶有容乃大、朴实自然的民俗审美趣味; 桃纹多以经过艺术化手法处理的桃树折枝形象呈现, 将单个桃果或并蒂桃果置于纹样中心位置, 周边围绕放射状桃叶、桃枝图案, 具有吉祥如意、福寿双全、百年好合的美好寓意; 莲纹中运用最广的是二方连续莲瓣纹样, 多出现于器物颈部或下腹部, 深刻体现出界首当地百姓对自然世界的热爱与亲近。



图2 界首彩陶纹样装饰

2. 界首彩陶动物纹样

界首彩陶上也常常出现动物纹饰, 如鱼纹、鸡纹、牛纹、鸟纹、龙纹等, 不仅刻画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常见的动物纹饰, 同时也广泛地描绘界首当地的动物形象, 其造型简单明快, 极富乡土人文气息。例如界首彩陶中的鱼纹通常以写实的刻画手法表现, 鱼的造型厚实有力, 形态灵活自然, 线条简洁流畅, 极具民间工艺美术花纹造型自然朴拙的趣味; 并且鱼纹含有丰富多彩的吉祥寓意, 如鱼纹与莲花纹的组合寓意“年年有余”,

鱼纹和海藻纹的组合寓意“富贵有余”^[10], 均寄托了界首当地百姓对幸福美满生活的强烈盼望和执着追求。界首彩陶纹样对鸟雀形象也进行描绘, 鸟雀形象作为符号化图案可以对其自身动态特征和形态特点进行详细表达, 且多与具有吉祥美好寓意的纹样相结合, 传达更为丰富多彩的内涵, 充满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独特的艺术魅力。例如由当代界首彩陶技艺传承人卢莉华所制作的三彩刻花花鸟纹瓶, 以水鸟和荷花作为主体纹样, 颈部、肩部及下腹部装饰二方连续莲瓣纹样, 视觉效果

显著突出,不仅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也显示界首彩陶工匠高超的制陶技艺与艺术审美。

3. 界首彩陶人物纹样

界首彩陶人物纹样通常以历史故事场景、戏剧故事场景、木刻插图人物场景、传统神话人物场景等作为创作设计的蓝本,以巧妙细致的构图和粗犷夸张的造型见长,呈现质朴大气的装饰效果。例如界首彩陶人物纹样中最为著名、最具标志性的刀马人刻花纹样便是20世纪50年代时以卢山义为代表的一批制陶工匠以传统戏剧人物中武将形象为基础,大范围汲取刺绣、木刻年画、水印木刻插图等界首当地特色民间艺术的造型元素和艺术精髓,通过对明暗、关系、线条、色彩的灵活运用与精准把握,结合自身对界首彩陶的理解而创作出来。刀马人纹样采用散点透视的设计手法,将正面人物身体、半侧面人物面部和全侧面人物肢体相融合,构成极富民间朴实趣味的人物纹样造型;在动态表现上运用公式化的正面身体与自由灵活的四肢相搭配的手法,形成自然和谐、稳定统一的纹样,在洒脱飘逸的纹样中表现刀马人的生动形象,审美取向贴近当地民众,极大凸显了纯真质朴的装饰效果。

作为“中国近代四大彩陶”之一的界首彩陶,其纹样装饰无论是植物纹饰、动物纹饰还是人物纹饰,均刻画出中华民族近千年来地域文化的轮廓,折射出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民间审美。界首彩陶作为中国传统民间工艺美术的代表,既无需和宫廷工艺美术一般去刻意迎合封建君主的喜好,也不用如文人艺术一样需要展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朴素美学境界,界首彩陶工匠在纹样装饰的创作上可以无拘无束、潇洒自如,无论是繁琐细致的植物纹样还是洒脱飘逸的人物纹样,无一不是当地工匠在陶坯上直接刻画。界首彩陶纹样刻画时的笔触线条亦是民间工艺美术的艺术表达之一,深刻体现了民间工艺美术的自然恣意。在界首地域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界首彩陶,不仅凸显出中国传统民间工艺美术所特有的敦厚朴实和夸张诙谐,也体现出界首当地民众朴实无华的乡土审美倾向;不仅展现出界首当地多姿多彩的民俗活动,也反映出界首当地百姓坚韧不拔、百折不屈的

优良品质,为当下学界的彩陶艺术特点研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实物资料。

(二) 界首彩陶的器物造型与釉面色彩

界首彩陶作为民间工艺美术,多用于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因此极具质朴自然的乡土审美趣味,这一点在界首彩陶器物造型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突出。界首彩陶按照器物造型的不同可分为壶类、瓶类、碗盆类、坛罐类。

界首彩陶釉面色彩和器物本身的关系实则可以看作是一种建立在空间形象呈现方法上的造型装饰形式和艺术表达手法,简单来说便是将纷繁复杂的自然形象处理为“图形-器物”两个简练纯粹的视觉层面,从而最终呈现出鬼斧神工、巧夺天工的视觉艺术作品。许多传统艺术形态和艺术活动,如国内的徽州三雕、磁州窑瓷枕、苏州刺绣、元代青花瓶等,国外的日本浮世绘、玛雅壁画、古希腊陶器等,都属于这种造型装饰形式和艺术表达手法的范畴。界首彩陶也使用了这种形式和手法,质朴自然、粗犷豪放的器型和柔和雅致、喜庆温暖的釉色同时呈现于器物之上,使参观者和使用者印象深刻,并奠定“彩陶”基调。

1. 界首彩陶瓶类器型

在界首彩陶众多器型中,瓶类是数量众多、最具特色的种类之一,其主要起装饰陈设作用,结构曲线收放变化小,实用性不高。界首彩陶瓶类器型汲取了同时代磁州窑造型特点,瓶口细小,口沿部为短外撇变形状,肩部饱满圆润,颈部细短光滑,上腹部向外微张,和肩部过渡自然,下腹部则向内微缩,增强器物的艺术性。整体器型轮廓方正挺拔,造型朴实敦厚,虽无磁州窑、繁昌窑、景德镇窑所产瓶类器型的柔美素雅和灵动飘逸之感,但蕴含了界首彩陶所特有的庄重敦厚、自然淳朴、夸张诙谐的艺术特点。

2. 界首彩陶壶类器型

在界首彩陶中,壶类属于体型较大的一类,如图3。其高度多在30 cm以上,圆肩直腹短颈,其顶端通常为圆形碗状盘口,盘口下部略微向外张开,通过多层加厚结构的方法以保证盘口的质量,避免因磕碰导致破损碎裂。盘口下方由壶颈连接壶体,连接处无明显过渡,壶颈通常较短且无曲线变化,以圆柱形为主,进一步体现界首彩陶质朴的民俗气息。壶体曲线与坛罐类器型中的折肩

罐相似,但壶类器型的上腹部形态更接近于球体,以便后续安装;下腹部线条更为直挺,与壶颈线条相呼应;壶底面积较大,底部直径大致为壶腹部最大直径的三分之二,使壶体站立更加稳定,形态更为朴厚。壶体肩部置有一呈45度角倾斜的短流,整体为圆柱状,上部向外倾斜为更顺畅的直营水流,下部通过拼接的方法安装于壶身之上。壶体系组多为工匠手工制作成型,用黏合剂置于肩部与壶流对称平行处,轮廓饱满圆润,蕴含民间传统工艺美术特有的艺术趣味^[11]。



图3 界首彩陶盘口四系壶

3. 界首彩陶碗盆类、坛罐类器型

界首彩陶中碗盆类器物种类繁多,按照日常用途的差异可分为面盆、水盆、鱼盆、汤盆、盥洗盆等,按照外部形态的不同可分为卷口盆、敞口盆、折口盆、板沿盆等。以三彩刻花鱼纹盥洗水盆为例(见图4),其以半球形为基本形态,口径30cm,底径15cm,整体造型浑厚饱满、生动质朴^[12]。传统界首彩陶中的坛罐器型普遍较显矮胖,底部较大,重心较低,表现出朴实厚重的视觉效果;从器型曲线和线条感来看,坛罐器型多运用具有力量感的曲线,在曲线饱满的基础上赋予其运动趋势。例如直口圆腹罐这一器型,口沿厚实,颈短肩圆,上腹部微凸且饰有装饰纹样,腹部饱满,以和谐均匀的弧度向外鼓胀,下腹靠近底面处设置数圈凸起楞线,起到防止烧制过程中釉料滴落的作用。在视觉效果上,直立的凸起环带与罐口的直口相联系,使整体器型更为和谐统一。罐底面积较低,不仅使摆放更为稳定,而且将视觉中心下移,使直口圆腹罐敦实厚朴的艺术特点进一步凸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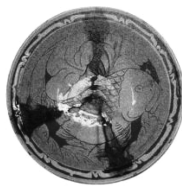


图4 界首彩陶三彩刻花鱼纹盥洗水盆

4. 界首彩陶赭红、明黄、褐绿的釉面色彩

界首陶瓷利用柔和雅致、喜庆温暖的赭红、明黄、褐绿三色形成一种匠心独具的三彩风格^[13],呈现于界首彩陶的釉面之上,如图5的三彩罐。界首彩陶釉面色彩中的“赭红”,是当地工匠将一定含量的石英粉作为着色剂加入底层化妆土之中,入窑烧制后,两者产生化学反应后呈现出来,并与上层白色化妆土形成了对比强烈的“红地白花”的特色风格,喜庆大气、张力十足的表现形式受到界首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明黄”也是釉面色彩装饰的主色调之一,由陶器最上层的黄色透明釉烧制后呈现,伴随窑内烧制温度的差异也表现出不同的颜色效果,如窑温稍低呈现浅黄,窑温稍高呈现深黄,窑温一旦控制得当,釉面便可以显现出柔和含蓄的明黄色调。界首彩陶釉面色彩中的“褐绿”并不是主色调,而是由工匠在施釉后于器物表面随意点上几处铜绿色釉而成,它更多地作为渲染艺术气氛和拓展视觉深度的“神来之笔”,以色衬形、以虚衬实,为界首彩陶的艺术创造提供更为丰富的展示手段。



图5 界首彩陶三彩罐

界首彩陶的器物造型和釉面色彩,不仅在视觉享受和实用感受上给予使用者良好的体验,并且蕴含着丰富的界首当地民俗文化精髓,折射出界首当地百姓的审美取向及思维形式。界首彩陶质朴自然、粗犷豪放器的物造型与柔和雅致、喜庆温暖的釉面色彩均显现出界首当地百姓憨厚敦实的人物性格及卓尔不群的艺术审美情趣,表现出界首人民热爱自然、追求和谐的心境^[14]。界首彩陶器物造型与色彩艺术内涵丰富充裕、文化寓意深厚长远,以其独特的艺术文化氛围,凝结无数当地艺人工匠智慧之结晶,最终使界首彩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工艺美术极为关键的部分和发扬传播界首地域文化精粹和民俗文化

精华的最佳艺术载体。

界首彩陶波澜壮阔的发展脉络和敦厚质朴的艺术特点,折射出丰厚的界首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内涵,镌刻着源远流长的皖西北地区民间工艺美术的艺术色彩和文化底蕴,这也使得界首彩陶成为当地百姓内心深厚情感的艺术有机载体,寄托人们对于人丁兴旺、儿孙满堂、自由自在等美好生活的热烈盼望。积厚流光、源远流长、兼容并包的民俗文化基调,使得界首彩陶顺理成章地成为界首地域文化引导、艺术欣赏及社会道德教育的普遍载体。如今它的文化艺术价值已超越彩陶艺术本身,也不局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称号,其蕴藏着界首地域文化的灵魂和民间工艺美术的根基,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扬传播界首地域文化精粹和民俗文化精华的最佳艺术载体。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一件艺术作品、一类艺术技艺的产生、发展、演变及衰亡都依存归属于它们所处的时代、民族、地域及环境。”^[15]界首彩陶是皖西北地区乃至整个徽皖地区最具象征性和代表性的民间传统工艺美术,当下学界应当大力支持其基于淮河流域界首地区独特地域文化基础上开展的理论性与应用性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探析界首彩陶背后所蕴涵和凝聚的文化本源,充分利用界首彩陶在当代的应用传承与发展具有的价值和影响。

参考文献:

[1] 周魁一.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M].北京:中国书店,

1990: 276.

- [2] 高峰.界首戏曲人物纹饰彩陶的成因及其艺术特征[J].装饰,2012(1): 116-117.
- [3] 杨建华.淮北隋唐大运河出土的古陶瓷[J].收藏,2012(9): 48-55.
- [4] 周京京.承古开今的界首彩陶[J].收藏,2013(9): 94-97.
- [5] 范慧君.界首彩陶纹样“刀马人”中的戏曲因子[J].装饰,2015(10): 92-93.
- [6] 闫小敏.写意雕塑浅析:兼论闫玉敏雕塑艺术创新性[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7(3): 105-109.
- [7] 谢亮,阳巧.界首彩陶装饰的审美意蕴[J].装饰,2013(2): 98-99.
- [8] 吕青,周意岷.试析陕北民间艺术的文化特质[J].宁夏社会科学,2017(1): 244-246.
- [9] 赵燕飞.民间陶艺发展过程中设计意识的造物显现:界首彩陶器形及装饰图案研究[J].美术大观,2014(11): 63.
- [10] 高峰,吕哲.界首彩陶的民俗意蕴探究[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143-145.
- [11] 赵燕飞.界首彩陶的设计美学研究[J].美术大观,2014(9): 91.
- [12] 沈燕,俞放.界首彩陶的文化生态[J].美术观察,2010(9): 109.
- [13] 刘东.剔花粗犷绿彩传承:安徽界首窑彩陶器[J].东方收藏,2018(6): 45-48.
- [14] 高峰.界首彩陶的本原文化[J].文艺研究,2009(4): 153-154.
- [15] 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46.

责任编辑:陈璐